

后现代生态伦理观对我国西部开发的借鉴意义

李建军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研究西方的后现代生态伦理观, 讨论我国西部经济发展中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在充分肯定这一理念对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现实意义的同时, 提出西部开发有关整体性、系统性、多元性和建设性的4种可供借鉴的积极思想。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生态伦理; 可持续发展; 中国西部开发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4X(2003)03-0039-05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of world view of postmodernist ecology for China western development

LI Jia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researches western post-modernist ecology theory, and discusses the continuous strategy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ern area. While affirming the instructiveness of the theory in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article brings up the four positive thoughts of integrity, systematic, diversity, and constructivenes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Keywords: postmodernism; ecological eth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western development

后现代生态伦理观是以有机整体宇宙创造进化论为基础的。后现代思想家科布和格里芬侧重建设性后现代方面, 怀特和奈斯则从生态伦理方面, 强调应淡化人类的主体性, 主张以全部生态自然为整体, 形成包括人类和其它物种及生存环境在内的整体生态伦理。这种后现代生态伦理观对解决日益突出的自然资源和地球环境问题、规整协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倡导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有着指导意义。将这种理论运用于我国西部开发的实践中来, 无疑具有建设性的借鉴意义。

1 和谐: 把握后现代生态伦理观的核心

美国后现代思想家科布及学生格里芬, 主张复兴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关于有机整体创造进化论的观点, 以克服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 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伦理关

系, 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类是与环境具有“内在关系”的“社会存在物”, 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应“道德地”对待自然。人作为主体不应片面地将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物, 而应在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来重新定位人的地位和作用, 努力做到在生态自然系统的允许限度之内, 在保持生态平衡的条件下从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物还包括费雷、凯勒等人^[1]。

他们共同的理念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具有连续性。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不只限于人类, 构成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也不只限于人和人的关系, 还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以及其他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一切都与自然相关, 人与自然的这种连续性也包括了人与其他创造物之间的连续性, 它们的幸福也有助于人自身的幸福。正如系统科学所表明, 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 生命系统表现为网络格局。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从物种层次、生态系统层次到生物圈层次都

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任何生物和自然都拥有其自身的固有价值,作为道德代理人的人类,更应当珍惜和爱护生物和自然,承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价值。

基于上述观点,后现代思想家把“共同的福祉”看作是人类社会首要的追求目标。在科布看来,自然科学、生态危机、种族歧视、女权运动、军备竞赛等诸多现实问题,决非孤立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正是我们许多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应该提倡这种发展观点,把自然的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整体、综合地统一起来;应该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伏的现象;克服单纯寻求“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这种发展观的片面性。他强调,拒斥基于经济主义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寻求经济增长,而是要表明^[2]，“我们应该寻求的是那种大写的增长,即经济福利之实际的改善。”

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定向自己的行为等问题上,生态伦理学有较多的理论创新。怀特在列举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源于基督教思想传统、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征服与宰治自然的观念是引发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生态伦理的主题不应只强调生态伦理的本质是价值主体人之间的伦理,而应包含自然在内;哈丁则将现代社会人们竞相开发地球自然资源以发展经济的心理机制,比喻为众多的放牧者在有限的公有地上放牧,如果没有法律、伦理规范等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制约,每个放牧者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都会不断增加牛的头数,最终导致公有地受到灾难性破坏的危险。深层生态学的开创者、挪威学者奈斯把生态危机归结为当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认为其根源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自然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兴起,特别是与第三次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相互推动和促进,现代生态理论已发展为多种流派。生态伦理主要观点可概括为:倡导人们既要尊重人,又要尊重自然;既要尊重人类文化,又要重视自然生存;既要重视文化价值,又要重视自然价值。这种生态伦理观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界和生命系统,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视野和新维度。它要求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必须实现其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征服、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发

展或当代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和能力的同时,有义务遵照自然的生存能力,并尽可能为恢复和增强自然生产能力而给予自然必要的能量补偿与保护,以便保障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决不能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

以有机整体宇宙创造进化论为出发点的后现代生态伦理观,强调生态自然是指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整个地球环境;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生态自然对人而言体现着某种生态伦理价值。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当代人中公平使用生态自然资源的问题,涉及到的是资源共享时的利益公平性问题。二是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如何处理好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问题,涉及到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间着想的问题。三是在人对生态自然的开发利用中,如何实现人的“善”与自然发展的“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问题,涉及到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的伦理关系从只对人本身延伸到生态自然的范围内,使生态自然本身更和谐地发展的问题。这些后现代思想家对推动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尼采、海德格尔、怀特海、罗蒂等人也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为了寻求解决与人类生存生死攸关的生态危机问题,科布呼吁人们向非西方文化开放,向西方的生态智慧开放。为此,他给予中国古代道家的生态智慧极高的评价。但他反对道家的“无为”观念,认为道家的无为思想“使得它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对他人毁灭生态的行为束手无策”。科布用地方或区域经济试图挑战或消解跨国公司的霸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科布的理论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意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客观和重要的经济现象条件下回归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藩篱,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科布寻求的社会理想是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生活的社会,然而他未能提出一种双赢的观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后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缺陷。斯普瑞特奈克指出^[3]:现代社会中两大分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把目光集中在物质扩张的过程上,它们假设社会中一切社会和个人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物质产品的不断增长而得到解决,根本不去多想耕地、空气和水这些实际的物质条件。尽管跨国公司和政府有极度现代的宣传攻势,但谁都知道,当一个国家生态的生命维持系统逐渐为GDP的大幅增长所吞噬的时候,这种发展肯定是大错特错。她提倡

说:“孔子和老子都认为,与自然保持和谐是最重要的,这比单谈‘环境保护’要深刻多了.我所提出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子关注自然的精妙过程,与孔子强调培养道德领袖及人类对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感有共同之处.”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和有积极意义的,而建议则富有建设性和现代性.后现代思想家关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借鉴东方生态智慧的学说,在理论价值及现实作用上确实更富有建设性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2 整合:制定我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高速增长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巨大胜利的同时,开始面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文化危机.持后现代生态伦理观的许多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都从文化层面检讨人类自身的行为,对技术理性的过分膨胀和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提出了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体现在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之中,另一方面则推动了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兴起.随着当代人类环境意识、生态意识的觉醒以及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广泛受到重视^[4].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不能走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进行掠夺式开发,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主要突出其资源优势,首要的选择是利用好自然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不损害自然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前提下追求人类活动与大自然的协调.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环境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文明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是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人口爆炸;二是科学技术革命;三是思考我们同环境关系时的方式,即只顾眼前不顾未来、只顾自己不管他人、只顾当代不管后代.由此可见,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暴露出人类深刻的道德危机,经济高度发达,技术手段先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是高质量生活内容的一个方面;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青山绿水,有清洁的空气、秀美的天空、花一般的田野,这才是未来人们高质量生活的全部内容.两者缺一不可.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永恒主题.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5]:“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

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朱镕基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强调:“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西部地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还是从生态环境建设、资源可持续利用看,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是整个西部地区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需关注的问题.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西部地区社会经济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相比长期处在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由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科技、教育十分落后,财政收入绝对数很低,森林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严峻,物种生长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过度的放牧、盲目的毁林垦荒和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使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我们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必须重视生态伦理问题.

西部大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由西部大开发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西部大开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的大开发,也不是单一地追求经济增长,而是以西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整合、持续发展为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关注生态利益,优化生态系统;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还要培育资源的再生能力,确保持续利用,不能用竭泽而渔、粗放掠夺的方式开发自然资源;在征服、改造自然时,要协调保护与建设二者的辩证关系,营造当代人生存与发展 and 子孙后代能够持续享用的生态环境.建设好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培育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可持续性则是西部大开发初期建设的重中之重.如果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西部大开发不仅不能收到预期应有的实效,其结果将会给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西部建设,我们决不能把追求短期利润作为唯一的开发动力,而应从长远的目标出发,充分认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充分尊重大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决不能任意利用、支配、统治大自然.以生态伦理规范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行为是保护西部地区人民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在西部可持续发展中,必须以生态伦理作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开发行为,在保护中求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西部建设中我们还

应更多地考虑国际因素,既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又要注重国际因素积极的一面,为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确立,对西部人民来说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只有决策者和实践者共同以生态伦理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收到预期应有的实效.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主义者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其核心观点批判了世界经济增长单以GNP为主要衡量标准模式的弊端.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在《超越增长》一书中认为,新环境主义的核心强调“发展”而不是“增长”.增长是指通过物质吸收实现规模上的扩张和量的增加,而发展指的是质的变化和潜力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将经济活动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个系统的发展不能超过母系统所能承受的规模.按照卡逊和戴利的理论,可持续发展超越增长,但并不意味着经济的终结.相反,它是可维持的、有质的改进的、适应自然限制的、微妙复杂的经济.它是更好的经济,而不是更大的经济.它需要对数量型发展观进行清理,建立以福利为中心的质量发展观.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整合一切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来克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以求得可持续发展.

3 借鉴:寻求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态危机的现实,表明人类的不合理活动正在使生态环境恶化趋向极限,同时也把人类自身置于危险的生存困境.后现代生态伦理观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无权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促使我们重新省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培养人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与爱戴之情.后现代生态伦理可借鉴的积极思想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3.1 整体性的观点

科布认为,现代的世界观是一种以忽视和牺牲自然为特征的世界观,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已经使得许多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并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如不予以遏制,人类也必将招致相同的命运.后现代生态伦理观昭

示人们的是:我们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中,而且包含在自然中.事实上,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世界之中,世界也是不完整的^[2].在世界各系统中,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即生态系统.系统中各种生物因素(包括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和环境因素按一定规律相联系,形成有机的自然整体.后现代生态伦理观关于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后现代生态伦理观强调应该做到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因此,后现代思想家反对那种继续大规模破坏其他生物而破坏自身享受和未来人享受的“进步”形式,它还反对那种回到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理想.后现代生态伦理的原则、核心和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类整体在自然界持久地生存和更好的生活.一部分人正当利益的获取不能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为代价,人类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不能掠夺子孙后代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应将人的发展置于首位,切忌对生态环境为了保护而保护,而应寓于保护开发之中.树立质量和效益至上的发展观念,不盲目追求和攀比,应以质量和效益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3.2 系统性的观点

奈斯认为,科学的生态学强调最好地维持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这种系统对地球一切生命都有益.生态学在深层次上展示的生态智慧,突出人类像其他物种一样,一个全面的伦理学应将人类以外的生命也作为道德关注的对象来考虑.人应该按照生态学的模式,通过各种联系的网络将自我向外延伸.人类生活最丰富之处,是与生命共同体的认同.有了这样的认同,人类将会正确地保护自然环境.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运行规律和生态平衡,但这并非说人在自然面前不能有所作为而完全听命于自然的摆布.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有理性、有智慧的生物,应当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利用自然规律,改善自然状态,显示人类的价值和意义.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二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轻视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最终也无法实现.因此,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双赢”,就必须二者兼顾.可供西部可持续发展借鉴的具体做法:一是坚持科教战略.教育先行,科技为本,增强

可持续发展人才支撑能力;二是坚持非均衡发展.实施部门非均衡战略,不必过度追求一、二、三产业的比例.重点抓好优势产业,实施地区非均衡战略;三是发展特色经济优势.诸如包括水能、有色金属矿产、特色旅游等资源优势;包括生态多样、与内地差异巨大,特别是珍稀生物的生态优势;也包括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和生产方式上差异显著,成为发展特色产品、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民族特色优势等.

3.3 多元性的观点

推崇多元化,对多元的尊重,是后现代生态伦理观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认为:“在现代世界观中,一种救世的进步观将经济扩展和技术革新放在核心的地位.现代政府(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关心的只是安全防御和推进扩张,而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被认为是尾随其后的.”她指出,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肉体之间的破坏性的断裂.她呼吁人们透过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观察其背后的根源.她特别强调:地球的行为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通过自我调节海藻和其他生物有机体的数量来积极保持大气层中维持生命的化学成分.在大气层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地球不可能保持其生物圈的生命维持条件经久不变,所有这一切的依据在于,生命是一个地球生物圈相互作用的现象.斯普瑞特奈克批判了西方现代性造成经济、生态、种族等方面的多种负面效应,主张人、社会与自然是有机关系的链条,并倡导绿色政治运动.

3.4 建设性的观点

建设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生活、工作的优美环境,始终是生态环境建设追求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包括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和可持续生态三个方面的协调统一,它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经济的集约型增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持久利用、环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的公平以及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因此,我们的理想是要达到: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所解决的是人类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们对自然资源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对不可再生资源要奉行节约,切忌浪费,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要加强保护,以满足人类无限持续发展的需要.二是发展的协调性.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四大系统之间要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它所解决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

盾.它要求人口适度增长,不要滥伐自然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共生共荣,互为补充,协调发展.人们重新认识生态自然对人类的存在价值,须将生态自然系统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时空予以善待.三是发展的公平性.它要求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发达国家不能利用地球资源上的优势取代发展中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合理部分来达到他们自己经济发展的目的.

4 结束语

15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6]:“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现在看来,这种思想仍然具有极其现实的伟大意义,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的理想、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合乎道德的理解是经济发展和生态自然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是在实现社会的繁荣的同时也顾及到自然中事物的存在和演变的合目的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更深层面的含义是在追求用适合自然的审美价值来寻求生态道德中“善”与“美”的统一.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生态自然视为原初的、无造的自然物质生存条件,而且认为符合生态道德的自然应是同时符合人性和美的原则的“诗意的栖居地”.

参考文献:

- [1]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28.
- [2] 科布,格里芬.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59-160.
- [3] 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7.
- [4]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反思[J].求是学刊,2001,(3):43-4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83-284.
-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26.